



## 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 The Features and Trend of Contemporary Sports History of China

王俊奇  
WANG Junqi

**摘要:**近10余年,我国体育史经历了从危机迷惘到理性反思的转折,新一轮的体育史研究已经初见成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体育史研究的“第一波”;从体育史学研究的客观环境来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政府机构调整合并、科研人员流失转向、新老研究人员接替不上等状况到2006年前后有一定的好转;关于我国体育史学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讨论十分活跃;在当代体育史学领域里,计量史学的运用日渐增多,优势明显,历史计量化是20世纪历史学领域出现的最显著变化之一。我国的当代体育史研究既是对传统体育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体育史学者们对当代中国体育史艰难转型的历史思考。

**关键词:**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特点;研究趋向

**中图分类号:** G 80-05 **文章编号:** 1009-783X(2014)06-0507-07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In recent 10 years, China sports history has experienced from the crisis loss to rational reflection. The new round of sports history study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The first wave of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began in last century 50s and 60s. From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of sports history study, the tide of market economy,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of adjusting and merging, the lo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old and new researchers on the replacement have a certain impr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2006.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sports history in China is very active in the field of modern sports history. The use of measuring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advantage is obvious. Historiography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quantitative changes appeared in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s not only criticis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the traditional sports history,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inese sports history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features; trend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客观上为中国体育史学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社会环境,使体育史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型成为了可能。经过几年的困惑,虽然有一批体育史学者转型,但仍然有少数中年学者坚持不懈,以及新涌现的一批年轻博士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他们置身于变革的时代,热心新史学的建设,逐渐将目光转向更新传统、寻求新的史学方法,深入思考传统体育史学的出路。于是,曾一度陷入危机的体育史学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其中,体育思想史、体育文化史、民俗体育史的兴起引人注目。这不仅反映了体育史学研究在艰难复杂的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体育现状研究的新思想、新浪潮。

### 1 当代体育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整个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体育史学营造了新的生态环境,但同时也使体育史学受到了较明显的影响。受到政府机

构改革、体育史课程缩减、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等思潮的影响,体育史学领域陷入研究队伍分散、人员转型、学术成果突然减少的危机之中。2005-2006年以后,体育史学逐步认清了形势,通过努力转型,认识到体育史学新的历史使命,端正了态度,重新评价和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的体育史学,重整旗鼓,使体育史学开始向理性和求实的方向迈进,并表现出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议论、各种思潮纷呈,如有人称这一时间为体育史学的“间歇期”“衰落期”“低谷期”“转型期”等。

总体上看,由于体育史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积极投入转型,加强新理论学习,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体育史学,尤其是古代体育文化史、体育思想史和新中国体育研究,都有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体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体育学界有着深厚的传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体育史研究的“第一波”。当时“首都体育学院以3位老教授(董时恒、孙仲达、李季芳)等为基础成立了“体育史学研究室(后1986年改称‘研究所’)”进行系统的中外体育研究,成为体育史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头雁”。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中国特殊的命运和背景决定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中国体育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动机和动力。在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体育史学界同中国的学术界连同体育界同仁一

收稿日期:2013-05-20

作者简介:王俊奇(1956—),男,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史。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南昌 330063

School of P. E.,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致,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承担中国的命运、唤起民众的爱国激情和自强自重为己任,力图通过自身民族古老的文化和体育历史的寻觅及展示,来实现自己学科在特定历史背景需求下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sup>[1]</sup>。这一时期出版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现代 20 家体育思想论稿》等 10 多部著作,使人们对上世纪 60 至 90 年代中国体育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对那段时期体育史学研究重新做出了较为科学的评价,特别对古代体育史、体育史料汇编及体育史学会的积极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老一辈从事史学的爱国热情、敬业精神,也都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和肯定,这对我们从当代新史学发展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体育史学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2) 从体育史学研究的客观环境来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政府机构调整合并、科研人员流失转向、新老研究人员接替不上等状况到 2006 年前后也有了一定的好转。2005—2007 年体育史学发展的又一大特点是《中国体育通史》的编辑完成及高校体育史教材的出版,以上成果推动了我国体育史的研究和发展,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体育提供了理论基础<sup>[2]</sup>。特别是进入 2008 年以来,以北京奥运会在我国举办为

契机,我国体育史研究形成了奥林匹克研究热<sup>[3]</sup>。有学者认为“当前体育史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多学科渗透和交叉。同时将体育文化学、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融入进来,进行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证性的研究<sup>[4]</sup>”。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入明显加大。诸如近年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有所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申报指标数量增加,体育人文基地增多(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已有 40 余个),各大体育院校、理工科院校的体育人文学科、基地的科研经费增多,图书资料、档案文献、科研设备等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备。举例来说,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自 2008 年成立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以来,受到学校领导和科技部门的极大重视,已先后投入经费 10 多万,基地 3 年新增图书近 600 册,建有 50 m<sup>2</sup> 的图书资料室 1 个,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桌椅、书橱等基础设备一应俱全。一些学术期刊也新增了体育文化研究栏目,国内国际体育史专题学术报告会、研讨会频繁举行,这些都给体育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平台和发展机遇。另外,有为数不少的高水平体育史研究著作得以陆续出版。

表 1 2006—2011 年体育史官修、私修著作

编号	书名	主编	出版年月	出版社
1	中国传统体育	冯国超	2006 年 5 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	中国武术史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2006 年 6 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
3	丝绸之路体育图录	李金梅、李重中	2008 年 4 月	甘肃教育出版社
4	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	王俊奇	2008 年 6 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5	体育思想史	崔乐泉、杨向东	2008 年 7 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6	中国体育通史	崔乐泉	2008 年 8 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
7	宋代体育文化史	王俊奇	2009 年 7 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8	图说中国古代体育	崔乐泉	2008 年 5 月	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
10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王俊奇	2009 年 6 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
11	汉画像石中的体育活动研究	刘朴	2009 年 10 月	人民出版社
12	汉代体育	刘秉果	2009 年 8 月	齐鲁书社
13	山东体育史	张洪涛	2009 年 10 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	杨祥全	2009 年 2 月	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
15	中国马球史	李重中、李金梅、夏阳	2009 年 1 月	甘肃教育出版社
16	中西方球类文化	王俊奇	2010 年 7 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
17	唐代体育文化史	王俊奇	2010 年 5 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8	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	王俊奇	2011 年 6 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以上著作都是学者们长期不懈努力、刻苦钻研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新的材料,尤其是采用了新方法,提出新观点,力求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中国体育通史》一书扬扬洒洒百万余言,是我国体育史大部头著述的创新。丝绸之路体育史研究也是不断有新材料、新发现,让人耳目一新。古代体育断代史、体育文化断代史的研究更有大的突破,为我国体育通史的研究增添了不少史料。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代体育史学研究的状况,将体育史的研究很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体现出由我国近 30 年培养起来的一代中青年学者,他们勇于挑战,对传统史学和我国体育史学进行改革与反思,从而使当代体育史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新气象。

当前,体育史学者们将范式导入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上世纪 60 年代西方新史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不仅注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元素,一些学者在体育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查、史料层向的细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以及开拓性建构<sup>[5]</sup>。

当然,中国体育史学并非是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复制,而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吸收、融合。在史学观念上还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体育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

应该看作是当代体育史学者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

3)关于我国体育史学发展现状与趋势的讨论也十分活跃。《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从‘寻根史学’到‘参与史学’的变革”，围绕20世纪中国体育史学的传统变革和转变进行了评述。其中，作者对中国体育史学如何从“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全过程进行描述，并介绍了《体育文史》杂志1984—1999年体育史学论文的研究现状，认为从1984年至1995年11年间，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占了61%，而近代体育史和外国体育史的研究只占15.2%，这种情况到1995年才有所转变。《体育文史》杂志无疑是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也是中国体育史研究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对中国体育史发展作出不小的贡献。

有些老体育史工作者面对体育史学的危机，积极参加讨论。诸如《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11期发表谷世权先生的《对新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该文富有深情地表达了他对新中国体育史发展的怀念，客观地评价了50年来中国体育史的研究现状，并对体育史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2008年奥运会应是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大显身手的又一契机，他期望届时能再掀起一次体育史研究的发展高潮。《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论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sup>[6]</sup>《中国体育史学的学术历程与发展》<sup>[7]</sup>《中国体育史学研究进程综述》<sup>[2]</sup>等文章也针对危机进行了讨论。

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立了体育史研究室(1986年改为研究所)，2008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专门开辟一个栏目，专题讨论我国体育史发展现状等问题。在2008年第7期上，有刘雪松的《30年来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聂啸虎的《中日体育史学在逆境下的奋斗》、郝勤的《体育科学的发展与体育史学的复兴》。作者开篇就指出：一位研究文化人类的先哲曾经说过，不能完整论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也是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民族。同样道理，对于体育以及研究体育的科学来说，如果没有自身的历史作为根基与基础，必然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这段话深情地表达了一个体育史学者发自内心的呐喊。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还在所网页上开辟了“体育史在线”栏目。在该栏目“创刊记一”中编导写道：“对于历史与‘历史学科’从来未敢轻视。《体育史研究在线》是我们小小的努力之一。我们深知我们‘才’与‘识’尚有所不及，但我们不曾想放弃！”这段话真切地表达了编导对成都体育史所的情怀和对该研究所未来发展的期望。栏目虽小，但对体育史学复兴所表现出的决心却大，事实上其中各期都有好文章发表，诸如第一期上的《体育科学的发展与体育史学的复兴》《体育史学科现状之改进散议》《中日体育史学界在逆境下的奋争》《从学科反思的角度看体育史的发展》等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其中论点发人深思，影响较大，是当今体育史学研究中优秀的栏目之一。

4)在当代体育史学领域里，计量史学的运用日渐增多，优势明显，历史计量化是20世纪历史学领域出现的最显著的变

化之一。“计量史学”即是其学理化的产物<sup>[8]</sup>。21世纪以来，计量史学在我国体育史转型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20世纪末计算机在我国普及以后，对我国计量史学是一个不小的支持，体育史学界普遍开始运用这种技术方法开展研究。2001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4届东北体育史学大会，会后程士钧运用信息统计学方法对大会131篇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全文共有6个统计表，结果发现：中国学者在体育文史类学科的科学研究问题上表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缺少国外同行长于历史考证和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日本和台湾学者在体育文史领域中表现出明显的传统研究倾向，日本和台湾对学校体育的研究兴趣明显高于中国和韩国<sup>[9]</sup>。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谷世权在《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一文中，也使用了历史信息学的研究方法，文章中计量了体育史学会成立后历年的全国体育史学术会议、1982—1999年重要的“官修”体育史参考书以及1984—2001年出版的“私家著作”。文章对新中国50年体育史学发展作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新的观点，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论现代社会的中国体育与体育史学》等，都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新理论。

在著作方面有崔乐泉的《图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冯国超的《中国传统体育》、王俊奇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史》、李重申和李金梅的《中国马球史》、崔乐泉主编的《中国体育通史》、谭华主编的《体育史》等，这些著作都对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文献、诗歌、地名等做出定量分析，并通过图表或数理模型的建构，探讨历史问题。虽然我国体育史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的时间不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方面已有一定的水准，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传统史学方法不可比拟的。

## 2 当代体育史学与传统史学及西方史学的比较

对中国当代体育史学的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社会和历史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一个问题刚解决，又会出现新问题，刚分析完昨天的事件，今天可能又有新事件发生，所以要全面地分析中国体育史，就有必要把中国当代体育史学与传统体育史学进行比较，将其与西方体育史学进行对比，以便于揭示其共性和特殊性。

1)当代中国体育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范围明显扩大，研究空间也不断拓展，其覆盖面涉及民传、民俗体育、体育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已形成多层面和网络系统。中国传统体育史关注身体运动与健康，具有使命和责任感的特点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扬，而传统体育史学偏重“寻根史学”，这其中教条主义和政治倾向均有所克服。关于体育史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中国体育史是什么、走什么道路”等问题占有重要位置。目前，我国体育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

① 古代体育史方面，例如中国古代体育通史、中国传统体育、中国体育思想史。

② 体育文化断代史方面，例如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史、宋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

③ 民俗史学方面，例如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

④ 武术方面，例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高教出

版社《中国武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等。

⑤ 地域史研究方面,例如西藏体育史、丝绸之路体育图录、山东体育史。

⑥ 运动项目史方面,有中国马球史、中西方球类文化等。其中一些是传统史学期长期研究的项目,例如中国古代体育通史、武术史等,但由于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使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中国马球史、唐代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等则都对历史链条上的缺漏与空白做了弥补,使体育史的研究趋向更系统与更完整。

2) 史学理论上敢于超越又是一个特点。经过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几年的所谓体育史学“间歇期”(有人称之为“转型期”)的追问与反思,体育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涌动、社会急剧转型的新形势下,推动体育史学的研究与发展,必须加紧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新的问题、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直接参与到中国体育的市场化、大众化及全球化的进程中去,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从近10年体育史著作、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来看,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的并非个人,而是一群人已经在这样做。有人在文章里写道:“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有一批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sup>[5]</sup>。在崔乐泉的《当代体育史学研究重点分析》<sup>[10]</sup>、《体育史与体育社会学关系辨析》<sup>[11]</sup>、郝勤的《体育科学的发展与体育史学的复兴》、聂啸虎的《中日体育史学界在逆境下的奋争》、刘雪松的《30年来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孙越的《中国体育史研究进展综述》、孙淑慧的《从学科反思的角度看体育史的发展》、曹守和的《体育史学科现状之改进散论》<sup>[12]</sup>。尽管有一些体育史学者认识到了加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也在努力改变现状,但总体上体育史学还是停留在历史考据和澄清事实的初始阶段,甚至不少研究仍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因此,体育史学如何开拓、如何创新,仍然是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体育史学也开始从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固守自封的害处,于是加强了对外的学术交流,通过近20年与国外体育史学界的广泛交流,确实增强了体育史学的发展活力。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受到挑战,并不断将西方史学作为先进文化引入中国,早年在台大历史系任教的姚从吾教授在上课时常喜欢讲“兰克主张”,讲“往事曾经如何如何”或“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写出来的学问就是历史学,这是20世纪初期欧美主流史学界的主张,强调“公正”及“因果关系”,而文辞优美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当代中国著名的人文学者钱锺书在浸润中西思想多年后,对于史学的看法也有其值得注意之处。钱氏指出史学之“体”有四,分别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而史学之“用”则为“劝善而惩恶”。总之,钱氏的史学观乃历史文章

可美,历史真相可求,历史可得善用,依据不同的史学层次及功能,可以兼具真善美<sup>[13]</sup>。这些史学思想受西方史学影响很大。在体育史学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体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也经历了东西方的碰撞与冲突,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1世纪初更是针对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吸收和引进西方史学一直是大家探讨的问题。体育史“间歇期”后,通过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所能提供的条件,通过浩瀚繁多的因特网上的体育信息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不断加深我国学者对西方体育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如通过网上的国外体育史资源了解到“北美体育史协会(NASSH)”,该协会网站包括协会简介、协会公告、协会奖、协会出版物、会议信息、最新信息等几个大栏目。还有“英国体育史协会(BSSH)”“国际体育及运动史协会(ES-SHPES)”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体育史学者也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的体育史,如《德国体育史学研究评述》<sup>[14]</sup>,该作者对20世纪至21世纪德国体育史进行了较详尽的评述,指出“在一定时期内,有的德国学者用‘西方体育中心论’和‘德国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得出不尽合理的研究结论。但是,总体而言,德国在体育史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成果显著。”国内学者在关注西方体育史进展的同时,也积极对新史学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客观实际的评价,但不难看出,国内体育史学者在引用和学习西方新史学进行研究,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批判性地吸收,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还是中西结合。说的具体一点,大家既讲究史学严谨和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力图再开放一些,努力做到中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sup>[15]</sup>。

4) 21世纪体育史有诸多新特征。其中信息化和网络化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体育史学者已经预见到把握信息革命是体育史转型和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于是,比较史学和计量史学等新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如孙越的《中国体育史学研究综述》一文中,就对国内外体育史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焦点进行了比较。程士钧的《中外体育文史的差异》,对中、日、韩、台湾体育史学研究做了比较。张晓琳和孙浩然的《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第8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综述》<sup>[16]</sup>一文对亚洲中日韩体育史学术走向及特点做了评述。在近10年的国内体育史研究中,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都大量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在体育史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波动曲线、数学模型、计量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这种方法对处理卷帙浩繁的古今文献和档案资料极其有效,如近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国说古代奥林匹克》《中国体育思想史》《中国古代体育通史》等,都是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其中计量学、图表在书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与上世纪体育史学不同的是,计量史学已经广泛应用到体育博物馆、体育史研究所档案管理、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学术统计、体育史信息传输等研究中。计量史学加上网络的普及,加速了体育史学的迅速发展,使体育史学在现在史学研究过程、史料的收集范围、体育史网站的发布、体育史学术和研究动态、成果的形成方式等都在发生变化,通过网络可以随时阅读一些网站的资料及文章,比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网页上“体育史在线”栏目,可以查阅国内外及我国台湾等地的

体育史学研究动态。

虽然,早期狂热的量化史学原来所宣称的能找到客观资料及精确的意义的可能受到质疑,但在体育史学中,至少量化史学能有效地克服思维、感觉、情绪等历史研究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偏差,在揭示体育史发展趋势方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5) 体育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向,相比 20 世纪体育史学,当代我国体育史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史学观点的多元化,21 世纪在我国史学界、文化界都受到世界新史学和新文化浪潮的冲击,社会转型也在加剧,我国体育史学逐渐从“寻根史学”“反思史学”向西方史学新范式转变。20 世纪,中国体育史学曾长期作为革命史、政治史的工具,在学术性和科学性 2 个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这种状况到上世界 80 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变,但真正的完全转变还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此时体育史才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作为官方舆论工具的体育史学几乎少见,学者们相对地感到学术自由,再不必自觉与不自觉地承担中国的命运,以此来实现自己学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学术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体育史所处的社会环境与 20 世纪 80 年代有相似之处,80 年代至 90 年代,体育史学界曾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各大体院体育史课程开设、体育史教材成果面世、体育史会议不断,一部部学术著作出版,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当下,新一轮的社会转型,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扑面而来,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特定环境里,体育史学必然会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然而,21 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复兴才仅有 10 年时间,在许多方面还需不断探索,后现代史学建立起来的否定“大写历史”;注重历史学中的“他者”;以及与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史等史学流派相比,在研究的细致程度和微观史上还存在一定距离,尤其是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科学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一批涌现出来的青年体育史学者,还需加强史学功底培养,在知识不断更新的同时,思想上还需要解放一些,更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只有打牢扎实的学术基础,体育新史学才有望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起来看,21 世纪以来的中国体育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问题研究的新动向,正如有人所言:“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出版,这标志着在新世纪的大门槛上,我国体育史学界已开始坚定不移地从‘寻根史学’转向了‘研究问题的史学’。”与此同时,中国体育史学的核心期刊《体育文史》杂志设置了《论坛》《调查与思考》《体育大市场》《文化视点》等栏目,2000 年又将《论坛》栏目改为《改革与发展论坛》,专门刊登有关当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做出强劲参与当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进程的态势<sup>[1]</sup>。

### 3 “史学革命”巨浪的余波

50 年来世界史学的变化可谓波澜迭起,20 世纪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表示了某种不满。随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相继到来,激发一场史学革命,史学界对专注政治、外交史和军事史的狭隘性发起了挑战,面对这种国际性的史学潮流,中国体育史学界同样受到了西方新思想、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强大冲击,并作出反应。

尽管一场史学革命已近尾声,但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仍处在这场革命的延续状态,这既代表了当代体育史研究的新趋向,并且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新环境将继续影响到体育史未来的道路。

1) 尽管理论与观念多元化发展是中国史学界的大趋向,但是在体育史研究领域,还有为数不少的中老年学者强调史学的传统范式,谷世权先生强调体育史工作者要沉心做学问,不要急于求成,要有“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要好好做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希望大家“要学习前辈唐豪和苏竞存(通读二十四史)那样的治学精神”,体育史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体育史要关注历史,更要关注现实,并把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各方面联系起来,尽最大努力对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发展做出合理的判断与解释。

2) 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一些过去研究的“空白点”和“雷池禁区”也逐渐被填补和涉足。例如,50 年来群众体育、运动健康观的发展、群众的休闲生活方式的演变,甚至有人对唐人的体育观、健康生活方式展开研究。一些学者对“文革体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陆续出版了《唐代体育文化史》《宋代体育文化史》《辽金元体育文化史》《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等著作,而这些工作还在进行中。此外,有一批学者在西方体育运动史、体育思想史、中国学校体育史、地域体育史、民俗体育史等方面也卓有成效。另外,有些学者还关注少数民族体育史,考古与体育史的关系、社会与体育史的关系等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新中国体育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如《新中国体育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等,还有西方体育史、武术史、运动史及养生史也逐步受到重视。总体上看,目前中国体育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一些过去难以涉及的领域和少有人关注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人民群众的健康观、休闲生活的微细变化,也正在被体育史学者们纳入研究视野之中。

3) 经过改革开放和多年的发展,体育史学界对体育文史中许多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以往那种单一的、武断的评价模式得到改变,逐渐被理性思考所代替,由一批中老年学者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思、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sup>[11]</sup>。有学者提到:“以往,我们笼统把体育史划归‘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甚至更多地视其为‘社会学科’,除了向学生传授体育的历史知识以外,更多地是在探索和揭示体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联系。”其认为“这是有失妥帖的、轻重不分的嫌疑,这可能也是导致目前高校体育史学科走向衰退、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sup>[14]</sup>。又比如对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问题、武术进奥运问题争论激烈,对新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反思迭起,对政府体育部门以及社会体育团体在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都逐渐引起体育史学界的关注。学者们更多的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所面临的复

杂国际形势来思考的,其中一些新认识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以上,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随着对新中国体育史、社会体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对当代中国体育的现状、中国体育史的走向以及体育史的创新与发展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学者对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各时期体育史做出了更全面、更为客观的阐述,更为公正的评价,注重“参与史学”,甚至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合理适用,都将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未来。

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研究来看,原来那种追求历史的社会科学化风气也逐渐削弱,历史研究变得更加分散、零碎和多样。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等引起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已将其运用到社会史的研究中,所以,在我国今后的体育史研究中,将从微观到宏观两方面有大的突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乃至体育大国,近年国力飞速发展,在世界,尤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中占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频繁,互相影响加深,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为更高层次研究不同时期的世界体育史、邻国体育史成为可能,况且各国体育史网站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优越条件。因此,在对本土体育史研究升温的同时,对别国和世界体育史的研究增多,有学者已经围绕“西方体育运动的历史变奏”——《体育史与体育哲学:从古代社会到当代世界》进行评析<sup>[17]</sup>。有学者围绕德国18~21世纪体育史学研究进行评述<sup>[16]</sup>。于此同时,古代微观体育史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李重申、李金梅、夏阳合著了《中国马球史》,该书不仅宏观地论述了马球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并对马球的球杖、球服、场地、马球子、马球赛场仪式都细致入微地做了研究。还有刘秉果的《汉代体育》,这不仅是一部体育断代史,书中对养生、帝王将相的狩猎和日常生活中的娱乐都有深一步的刻画。又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该书运用了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史的多种手段,围绕中国古代人体健康、娱乐生活、生殖崇拜、宗教、家庭、习俗等文化形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另外,有些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文学艺术与体育、考古与体育、哲学与体育,甚至对古代建筑、墓志铭、竹简、浮雕、丝绸、岩石、壁画、文字史、边疆史中的各类形象符号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从而使体育文化史的研究有了一定规模。

5)比较史学与计量史学等方法在体育史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量化史学的重大分水岭,有学者指出量化史学及心理史学曾被视为2种对传统史学方法最具有挑战性的新东西,但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它们未来的命运恐有变化。不过,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史学辅助科学的冲击基本上应该是正面的。在笔者看来,它并未完全颠覆既有的方法及理论,有些现象可能还是使用量化或其他趋向较有说服力<sup>[18]</sup>。21世纪初,由于我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技术在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作用,使计量史学在我国快速兴起,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体育史和东北亚体育史会议几乎都应用

了计量史学,尤其在回顾性、综合性体育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比如张宝强、刘博的《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史研究与探索》、张晓琳和孙浩然的《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第8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综述》<sup>[16]</sup>等、王俊奇的《体育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sup>[19]</sup>、崔乐泉的《体育史学与体育社会学关系辨析》<sup>[13]</sup>。计算机的应用解决了体育史学在分析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困难。目前,计量学在体育史的文献收集整理、档案管理、科学研究、信息资料,甚至在体育史教学、讲座等各方面得到普遍应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为特征的新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因此,计量史学在今后的体育史研究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有可能引起一次信息革命与史学革命的升级,计量史学也将成为体育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早就肯定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是一个好的治史方法,“可以应用到史学的全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统计的方法,“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都搜集起来,分别布局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sup>[20]</sup>。

比较史学是当代中国体育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又一特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史学界就开始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如“中西方体育起源之比较研究”<sup>[21]</sup>,尤其在《中西方球类文化》<sup>[22]</sup>一书中,作者指出:“中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类型的2种文化体系,没有对中西文化之真切而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很难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判断……通过中西方球类文化的横向比较,辨析中国球类文化与西方球类文化的本质区别,从而进一步阐述中国体育文化的本质。”其次,比较史学方法在体育史教材,论文中处处可见。尤其在古今体育史、古今奥林匹克运动史,东亚各国体育史研究中运用较为普遍。如郑国华、熊晓正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sup>[23]</sup>、程士均的“中外体育文史研究的差异”、还有“中外学校体育史比较研究”“东西方体育文化研究”“齐鲁体育文化之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比较研究”“中日大学校园体育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学者作了不同形式的比较研究。例如郑国华和熊晓正在2006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文章指出:“中西方体育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由于其演变和转型的路径不同,风格各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中西体育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和以勇敢、竞争、自由、平等、节制、谨慎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体育文化道德价值观成为了中西方体育文化选择的趋向,同时也决定了中西体育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当代我国体育史学者通过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民族风格、不同体育观念的比较研究,在探讨历史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历史运动特殊性的认识,因此,在比较史学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史学思维模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成都体育学院郝勤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一文中指出:“具体而言,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将在以下方面同传

统中国体育史学划清界线:

① 它意味着中国体育史学界将更多地将自己的视线从遥远的时空转向身边的体育改革发展的现实,对当代体育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类问题予以更多更强烈的关注。

② 它意味着一种开放性的外向性的史学观,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发展经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③ 它同时又是本民族传统体育传播者和开发者。

④ 在研究方法上,21世纪的体育史学将打破学科的壁垒和篱笆,更多地借鉴和采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

#### 4 结束语

在中国体育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体育史学也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温故而知新,温故也可以创新,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体育的好奇心最终导致了现代体育,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一样。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用历史的、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体育的过去,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体育,认清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以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sup>[18]</sup>。因此,我国为实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温故知新是很有必要的,也即需要在对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做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体育强国”的发展道路和统一的目标。总而言之,我国体育史学为实现振兴中华体育文化和民族精神做出努力,进行了一场中国体育史学的革命,也确立了21世纪中国体育史学走外向、多元、参与的新方向。

#### 参考文献:

- [1] 郝勤. 走向21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从“寻根史学”到“参与史学”的变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28(2): 5-7.
- [2] 孙越. 体育史学研究进展综述[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3(1): 15-20.
- [3] 刘雪松. 30年来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4(7): 6-7.
- [4] 聂啸虎. 中日体育史学学界在逆境下的奋争[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4(7): 7-8.

- [5] 邓星华.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与学术超越:读王俊奇教授《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有感[J]. 体育学刊, 2010, 17(5): 115-118.
- [6] 郎净. 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论21世纪体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J]. 体育文化导刊, 2005(2): 33-34.
- [7] 王俊奇. 中国体育史学的学术历程与当代发展[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7(1): 90-93.
- [8] 弗拉姆莱. 计量史学方法导论[M]. 王小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9] 程士钧. 中外体育文史研究的差异[J]. 嘉应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2001, 19(6): 105-107.
- [10] 崔乐泉. 当代体育史研究重点分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2): 28-29.
- [11] 崔乐泉. 体育史学与体育社会学关系辨析[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1997, 13(3): 1-5.
- [12] 曹守和. 体育史学科现状之改进散议[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4(7): 4-5.
- [13] 汪荣祖. 史学之体用, 槐聚说史论之一[J]. 台大历史学报, 1999(6): 375-376.
- [14] 潘华. 德国体育史学研究评述[J]. 体育科学, 2008, 28(10): 74-77.
- [15] 王俊奇. 当代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的学科地位与“文史合一”的发展[J]. 体育学刊, 2007, 14(6): 48-51.
- [16] 张晓琳. 传承, 创新, 和谐, 发展:第8届东北亚体育史学术大会综述[J]. 体育文化导刊, 2000(10): 126-128.
- [17] 石龙. 西方体育运动观的历史变奏:《体育史与体育哲学:从古代社会到当今世界》评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06(11): 80-84.
- [18] 王晴佳.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141.
- [19] 王俊奇. 体育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3): 7-11.
- [20] 梁启超. 历史统计学[J]. 史地学报, 1923(1): 2.
- [21] 王俊奇. 中西方球类文化[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0.
- [22] 王俊奇. 比较东西方祭祀活动与体育起源之异同[J]. 体育文史, 1996(1): 16-18.
- [23] 郑国华. 竞技运动何以能在西方产生:从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比较的视角[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6(12): 1620-1622.

(上接第506页)

- 声,杠箱来进贡,天平称一称,神胆来蹲底,幡鼓齐动响(享)太平。
- 2 北京民间香会十三档是按照庙宇的建置安排的,它们都具有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具体来说:开路即是为各路神仙打开道路;五虎棍是为人打开朝顶进香的道路;高跷会象征庙门前的栅栏;中幡会象征庙门前的大旗;狮子会代表庙门前的狮子;双石会代表庙里的门栓;擗子会代表庙门的锁;杠子会代表庙里的门栓;花坛象征神座前盛圣水的花坛;吵子会象征庙里钟楼上的钟;杠箱代表碧霞元君庙里的杠箱;天平象征着秤;神胆大鼓会代表庙里鼓楼上的鼓。
- 3 民间花会历史悠久,在表演时大都有音乐伴奏,载歌载舞,生情并茂。

- 历史上北京曾有300多档花会,“幡鼓齐动十三档”是老北京民间花会“武会”中的代表会档。2008年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档”是指一个具体的表演项目,“幡鼓齐动十三档”中的“十三档”指的是十三个北京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开路、五虎、秧歌、中幡、狮子、双石、石锁、杠子、花坛、吵子、杠箱、天平、腾鼓。
- 4 对首都北京长期发展建设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概括和总结。“北京精神”以“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为内涵,它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要求,体现出首都历史文化的特征,展现了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